

# 冷板凳上的成果

## ——《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述评

闻 莺

《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以下简称《精华》),刘禹昌、熊礼汇编注,荆楚书社87年5月出版。

书选八家文百零七篇。各家文前列作者小传,每篇文后有详注,有现代汉语译文,另有一篇精当的小评论;开篇冠以总论八大家由来及其特色的简明《前言》;又将韩、柳及宋六家各列一合编年表殿于书后。在古今八家文选注本中,这个体例可算相当完备了。

全书洋洋六十万言,除选文七万字外,余者尽为撰述。据《后记》,这五十多万字的撰述皆熊礼汇“一手一足之烈”,且曾三稿增损,中间汰去者复二十余万言,工程不为不浩繁;而礼汇同志断续六载于斯,冷板凳更不为不难坐难挨也。

我们当代人对于八家文,与封建时代的理学家、制艺家、乃至古文家的态度,自然难乎尽同。我们把它当作遗产——文化遗产,更偏重于当作文学遗产;我们对待遗产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要区别精华和糟粕,首先必须全面了解遗产。对整理研究遗产的专门家来说,这个前提尤为重要。所谓精华、糟粕,总是带有客观性和相对性,总是由专门家从全面了解中整理、研究、辨析得来的实在成果,而决不能以御批钦定为准,以时风势众为据,更不是望文生义和从概念演绎中能得来的。这样,专门家对同一范畴的真知灼见,便可比并而立,与“百家争鸣”的政策接通关系,精华、糟粕也便愈见分明。我读了《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之后,深感礼汇同志正是抱着这种诚恳、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惜坐几年冷板凳为八家文弄了这个新选本。

上千年来,对八家文的注解、阐释、抉发之类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初读一点,令人目眩眼花,若遍读搜索,便觉烦不胜烦。但认真的选注家,又非读不可。何况时代不同,观念不同,知识的叠积量也应不同,礼汇搞八家文选注决不象有些所谓新注本的列名者竟去抄袭坊间石印本。他广为搜求,遍览所见,往往为一字之感,检索累月,因斟酌去取,更废食忘神;真是洒身瀚海,入出两艰难!今观全书注释中征引的书目已过百种,陈列的论点不下五十余家,其弃而不取者更不知凡几!

然而八家文句,前人并非尽窥无遗,以讹为讹,避而不注,疏而不注者,时有所见。《精华》于此等处尽量不绕道走。如苏轼《黠鼠赋》有“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一句,其中“虫”字古人可以不注,近世人注便是疏漏。今天的读者对“鼠”与“虫”界说分明,每有疑惑,故本书简注“虫”为“动物的通称”。苏轼《颍州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自称“从表侄”,苏东坡怎么成了欧阳修的“从表侄”?过去注家都避而不言,或笼统说“从表侄”就是晚辈,但这是不合古制的。本书不避苛难作注。虽注中说东坡以乃父与欧公为从表兄弟难以据实,但找出了苏轼本人与欧阳修第三子确是儿女亲家这个根据。这在近人可称“姻侄”,古人用“从表”亦泛指姻亲,便庶几近之,能向读者有个交待。又如韩愈《杂说》之四:“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个“称”字,前人多释为“号称”、“称许”,本书则弃此而径注为“称量”。“称量”即常用词“衡量”,引申有“对待”意。试观下文千里马“尽粟一石”云云,则此“称”字实无关“称许”,而是指名马骈死槽枥间的致因,乃食马人“不以千里称也”。这才注出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的韩文特色。

《精华》不专辟校勘,但利于加深理解有醒人精神处,也常予指出。如上举韩愈《杂说》之“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便拈出朱熹谓“且字恐当在等字下”,并入注中。朱熹说且字在等字下,是按朱熹的行文句式来理解,故曰“恐当”;若按韩愈的行文句式,则未使不可以突出且字,仍置句前。又如东坡《前赤壁赋》:“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本与前面的“桂棹兮兰浆,击空明兮泝流光”成为大体对偶。但本书引况周颐《蕙风词话》谓宋人于此二句在“望”字后断句,便成为“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样,它

与前面两句虽不成对，而自身两句又成对了。这等处，本难论定优劣，更无法勘其正误，拈入注中，以供读者比索玩赏，识句式之变化无穷也。《前赤壁赋》中另一处“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通行本“作”作“适”。但今存苏轼墨迹本和康熙临书石刻以及《朱子语类》谓所见东坡手书，皆作“食”，本书便选用“食”字。不唯校改有据，且“食”确比“适”好。朱熹曰：“只如食邑之食，犹言享”；姜子柔曰：“佛经有‘风为耳之所食，色为目之所食’语，东坡盖用佛典”。

那些分析思想艺术被称为《说明》的短文，写得极有份量，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就篇幅言，最长一篇是分析韩愈《原道》的，实因内容浩瀚，命意曲折，不得已而长至千五百字。在百零七篇《说明》中，千字文实不过三五篇，余者皆五七百言，最短至用160字分析《与鲜于子俊书》，也精当得体。唯其无泛语、套话，也不拿腔作势，随言短长，行文就自然洒脱。就内容言，能抓住确为原文特色的要害处勾勒点染，虽是短文，便峥嵘可观。这类文字极难写。首先要有博观约取的拣择功力，山水画家胸藏天下景色又独具只眼，才有尺幅千里之妙。其次对所拣择出的要害处，又须如东坡所言，了然于心更须了然于口与手，即对所要勾勒点染的原文特点并非是一种模糊感受，而是能用明确语言表述出来的一种豁朗的文理。

《精华》这些短文，大多有此妙趣。如对曾巩《墨池记》，总括为“借事立论，因小见大”；从《宜黄县县学记》中，又进而指出“曾巩作记，往往能以井然有序的层次记述事件原委，又能跳出事件本身，生发深刻的议论”。对欧阳修《祭石曼卿文》，着重分析三呼曼卿的“几番转折”，“从人死不足悲入手”，而“令人悲”，而“不必悲”，归结到“不能不悲”这种“深婉曲折的哀哀情思”；而对《答吴充秀才书》，则主要阐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和欧公所言道的内涵。又如对王安石的《上人书》，指明作者“毕竟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论文”；对苏轼的《方山子传》，拈出它的“妙在传神，借烟波生色”；对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所选五篇，则告诉读者：“八记各自独立成篇，但所记游踪有一定的连贯性，在借山水以吐胸中之气这点上，又有它们的一致性。”诸如此类，虽未必都能发前人所未发，但对原文确有烛幽显隐的作用。在体例上，这些短文又被安排在原文、注释、译文之后，依次读来，《说明》都有落处，而读者从中得到启发。

这些《说明》，文虽短，还往往能以抉发原文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四处涉笔以扩大理解空间。如欧阳修说，韩愈写《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便似樊文”；何焯说，曾巩《寄欧阳舍人书》，是“摹欧而为之”；唐介轩更说，苏轼的《韩文公庙碑》，“置《昌黎集》，几无以辨”。这些前人之论被分别引入《说明》，简明指出古文家喜欢摹仿对方的文章风格来写志书碑铭，这使读者对诸家文风的体味比较，便容易发生兴趣。又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州罗地庙碑》，在《旧唐书·韩愈传》中都被指为“文章之甚纰缪者”。但本书《说明》，皆于辨正，指出《毛颖传》的“以文为戏”（裴度《寄李翱书》）正是“寓庄于谐，讽谕之义十分深刻”；《柳州罗地庙碑》之把柳侯死而为神灵的传说写入记载事功的碑文中，乃是“受到志怪小说的影响”和“晚年文学观点似乎又有变化”，“荒诞的题材，也有可能表现纯正的思想”。把这类辨正旧说写入《说明》，其作用显然仍在于阐发文意。又如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对樊绍述苦涩怪奇的文风称誉为“文从字顺各识职”，对于这个矛盾，后人解释纷纭。《说明》列举王禹偁、黄庭坚、刘攽、宋翔凤诸家的不同说法，以为皆“不确切”，“比较确切的解释”则为谢无量所说：“退之称之，殆以为犹愈对雷同剿说也”；又如王运熙所说：“在酷爱奇崛的人看来，奇崛过甚而流于艰涩，也仍然是通畅自然的”。这些征引，也并不游离，而是正确阐明一个关键文句，有助于对韩愈文学观的全面理解。

本书选篇也自有特色。所选篇目及八家比重，不雷同于南宋以来任何一个选本。试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所选八家文相比较如下表。

	韩	柳	欧	老苏	曾	王	大苏	小苏	合计
《经史百家杂钞》 选入篇数	95	31	36	9	15	31	14	3	234
本书选入篇数	26	22	16	4	6	7	22	4	107
两书所选相同 篇目数	19	8	9	1	3	3	3	2	48

(下转109页)

员阻挠法夫尔发言时，梯也尔喊道：“你们不要真理！”这位老牌资产阶级政客栽培那个“迷路的孩子”皮卡尔，自己不便提出的设想和方案让后者代庖。成为“议会制帝国”开端的奥利维内阁，得到了梯也尔有条件的支持。法夫尔干脆把梯也尔当作“我们中间最负盛名的人”。查阅梯也尔在立法团的发言记录，可以看到他的发言不时激起共和派的欢呼，而经常被波拿巴派打断。

可以认为，到第二帝国末期，曾经是七月王朝重臣和第二共和国时期秩序党头目的梯也尔，在观念上已由资产阶级君主派转向了资产阶级共和派。

注释：

① 参见拙文《复辟王朝时期的梯也尔》，载于《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梯也尔在七月王朝历任众议员、副财政国务秘书、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工程大臣、首相兼外交大臣。

③④⑥⑦⑭ 莫里斯·勒克吕：《梯也尔先生》，巴黎1929年版，第119、118、148、154—155、75页。

⑤⑬ J. —J. 舍瓦里埃：《现代法国政治制度史(1789—1945)》，巴黎1958年版，第223、230页。

⑧⑨⑪ 路易·勃朗：《八年史》，巴黎1860年版，第1卷第9、16—17、36—37页。

⑩ A. 雅尔丹、A. J. 杜泰斯克：《达官显贵的法国(1815—1848)》，巴黎1973年版，第156页。

⑫ 夏尔·瑟诺博司：《1815年以来的现代史》，巴黎版，第61页。

⑮⑯⑳㉑ 乔治·勒孔特：《梯也尔》，巴黎1933年版，第50、98、119、171—172页。

⑰⑱⑲㉒ 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3、110、130—131、131、107—108页。

㉓ 该函件称：“我请求你为我指定人员，以组成一个忠实地代表立法团多数派并且能与你协同一致的内阁。”——见阿兰·普莱西：《第二帝国史(1852—1871)》，巴黎1973年版，第219页。

㉔ 亨利·纪勒曼：《论梯也尔的登台和巴黎公社》，巴黎1971年版，第142页。

㉕ 吕加—杜伯尔东：《梯也尔先生全貌》，巴黎1948年版，第301页。

---

(上接126页)

可见本书标准与敝同乡“文正公”的标准大相径庭。一时不及检对《古文辞类纂》，就记忆所及，与古文派桐城大户也相去甚远。《精华》的选篇标准是“文章精华”，“所谓‘精华’指的是八家文中内容较好、艺术水准很高、能反映作者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前言》)这个标准无疑渗透有当代意识在内。至于严格按标准衡量有无冒选漏选，则各人见解和学识功力有别，难求全部认同。

较之选、注、评说，译文稍嫌逊色。为照顾初学者，不免过分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直译，就显得原文气韵不足。此外，在注释和译文中，也有个别不准确甚至因旧说而致讹误之处。但小疵小瑕，鸿儒尚且不免，又何碍于将此六载功成公诸世人呢？